

走新路 拓新地

——序周统权《语言理论与语言障碍研究》

翻开《语言理论与语言障碍研究》，浏览一下目录，便可大约看出周统权的学术历程。

他有较好的外语功底，可方便浏览国外的语言学、心理学、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研究。博士专业是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，故而对理论问题具有特殊的学术好奇心，即便是讨论汉语事实，仍能从文表文里看出他的理论用心。读博期间，他的研究兴趣聚在病理语言学，曾定期到医院观察语言病例，到神经语言学实验室做失语症的实验研究，之后到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，从事博士后研究，全身心投入语言障碍的研究。

《语言理论与语言障碍研究》的学术水平如何，待学界评，作为导师似不宜在此赘置美辞。但是，对他不断走新路、拓新地的学术冲动，我倒想多说几句；因为这种“不安分”的学术冲动虽主要来自统权的学术追求，但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统权2001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当时我虽然身在北京，但承蒙学校和邢福义先生的厚爱，学术关系还保留在华中师大，于是能与统权结下师生之缘。他送我的见面礼，是习作《“上”与“下”及其引发的不对称性》，文章虽不算成熟，但我却很高兴，因为没想到外语出身的他，竟然能够在对母语深入观察中伸展理论触角。我为他准备的博士第一课，本来就有关于母语价值的内容：母语是人生最为重要的精神营养，也是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学家最为重要的学术素养。语言研究要有国际眼光，也要有本土意识，应当重视对母语的观察，重视母语材料的运用，重视从汉语语言学中汲取营养。

那一时期，我比较关注病理语言学，也曾客串做一些聋儿语言康复的研究工作。中国患有语言疾病者，如聋哑、失语症、儿童语言发展迟缓、口吃、因唇裂和假喉而产生的发音障碍等，少说也得有几千

万人。研究不同类型的语言疾病，可以从生理、神经、心理等角度来探讨语言机理，更可以为这些语言疾病的诊断、康复提供帮助。在中国，这类研究实在太少，且分散在不同领域，由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，缺少沟通交流。使用的测试量表和康复方法多是借鉴国外的，不怎么切合汉语实际，需要“汉化”。凡有语言之地，皆应由语言学家的身影。中国语言学家应积极参与语言病理研究，改变在这一领域“集体失语”的状况，汇集各领域研究成果建立中国的病理语言学，联合各行业人士促成“语言治疗师”这一新职业的诞生。

统权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希望把失语症作为博士论文选题，我当然赞成。然而我也清楚，这一选题于师于生都是挑战。唐代鸿儒韩愈用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来概括教师职责，而对于失语症研究，我或许能起点传道作用，实难授业，更难解惑。对照韩夫子的要求，不称师职。但回念想来，导师导师，重在于“导”，主要任务就是提出问题，指示方向，创造条件，回答问题得靠学生自己。这样，也许更宜于培养出充满创造力的、胜于导师的学生。正如邢福义先生曾对我们说的：研究生研究生，自己研究自己升。

北京东方医院的张允岭大夫，是老年期智能障碍的专家，刚从日本完成博士后研究归来。我介绍统权跟随张大夫，了解失语症研究的医学范式，并长期观察记录一些失语症病例，树下了他失语症研究的第一根桩基。之后，又介绍他到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，跟随杨亦鸣教授进修神经语言学，搭建起了他的博士研究平台。博士毕业后工作了一段，统权希望到北京师范大学跟舒华教授读博士后。我当然赞成，因为舒华教授是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，近年来开展失语症病人、儿童阅读障碍及其脑机制方面的研究。善求师，对统权来说谓之“善求学”，对我来说谓之“善求助”，感谢诸位专家与我同膺导师之职。

“器大者声必闳，志高者意必远”（南宋文士范开《稼轩词序》）。统权从鄂西崇山峻岭中走出来，求学的历程又是步步关联且步步不同，现在距离他的初始专业，已经相当遥远了。他在走新路、拓新地的求学历程中，具有了优越的知识结构，具有了多个学科的学缘。我

现在想知道的是：

统权今后会怎样发挥这些优势，作出创造性的学术工作。在走新路、拓新地之后，怎样选择好学术操作面，进一步开挖出学术富矿来。

李宇明

2009年12月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